

厦门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摘要库

学校编码：10384

分类号_____密级_____

学号：10220131152427

UDC_____

厦门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原子化个体的形成与公共领域重建：斯大林
时期私人日记与萨米兹达特现象研究

The Formation of Individual Atomizatio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Public Sphere : A Study on Private Diaries
during Stalin's Era and Samizdat Phenomenon

曲爽杰

指导教师：周湘鲁 副教授

专业名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论文提交日期：2016年 月

论文答辩日期：2016年 月

学位授予日期：2016年 月

答辩委员会主席：_____

评阅人：_____

2016年 月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研究成果。本人在论文写作中参考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均在文中以适当方式明确标明,并符合法律规范和《厦门大学研究生学术活动规范(试行)》。

另外,该学位论文为()课题(组)的研究成果,获得()课题(组)经费或实验室的资助,在()实验室完成。(请在以上括号内填写课题或课题组负责人或实验室名称,未有此项声明内容的,可以不作特别声明。)

声明人(签名): 曲爽杰

2016年 9月13 日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著作权使用声明

本人同意厦门大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等规定保留和使用此学位论文，并向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学位论文（包括纸质版和电子版），允许学位论文进入厦门大学图书馆及其数据库被查阅、借阅。本人同意厦门大学将学位论文加入全国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共建单位数据库进行检索，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采用影印、缩印或者其它方式合理复制学位论文。

本学位论文属于：

- () 1. 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查核定的保密学位论文，
于 年 月 日解密，解密后适用上述授权。
- () 2. 不保密，适用上述授权。

（请在以上相应括号内打“√”或填上相应内容。保密学位论文应是已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定过的学位论文，未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定的学位论文均为公开学位论文。此声明栏不填写的，默认为公开学位论文，均适用上述授权。）

声明人（签名）：曲爽杰

2016年9月13日

摘要

对于苏联斯大林时代的研究是文学、历史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主题。70年代以来，北美苏联学研究发生了修正主义转向和日常性转向，由此引发了修正主义与旧有极权主义研究范式的断裂。本文尝试利用原有的研究范式辅之以修正主义提供的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和苏联日常性的新材料来重新分析苏联斯大林时代对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入侵和改造，以及后斯大林时代文学公共领域发生的新变化，并得出结论萨米兹达特现象重建了有效的文学公共空间并修复了个体原子化的状态。

在第一章，本文概述了斯大林时代个体原子化的现象及汉娜·阿伦特对它的批判；第二章利用修正主义学派提供的新材料，以日记为例分析斯大林时期思想改造和日常生活的特征，揭示在苏联闭合的意识形态影响下，原子个体所处的孤独状态及其面临的身份认同危机；第三章则分析后斯大林时代萨米兹达特现象如何重建了被破坏的公共领域及个体如何通过参与萨米兹达特的传播进而实现自我显现。

关键词 汉娜·阿伦特；原子化个体；公共领域；萨米兹达特；

Abstract

Studies on Soviet Stalin era were main topics for literary, history, sociological research. Since 1970s, Sovietology studies of North America had appeared Revisionism turning and daily-life turning. The Revisionism was obviously opposite to the old totalitarianism interpretation paradigm. This paper tried to utilize the original models with auxiliary of bottom-up study paths provided by Revisionism and Soviet daily-life new materials to reanalyze the invasion and transformation on private and public sphere in Stalin era, and the new changes appeared in literature public sphere of post-Stalin era. It obtained conclusions that Samizdat phenomena reconstructed effective literature public sphere and rectified the situation of individual atomization.

In Chapter I,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phenomenon of individual atomization in Stalin era and the criticism of Hannah Arendt. Chapter II utilized the new materials provided by Revisionism school, and took diary as cases to analyze the brainwashing and features of everyday life in Stalin era. It disclosed the isolation status of atom individual and its crisis of identity recognition under closed ideology influenced of Soviet Union. Chapter III analyzed how to reconstruct the damaged public sphere by Samizdat phenomena in post-Stalin era and individuals how to implement and complete self-disclosure through participating in the Samizdat further.

Key words: Hannah Arendt; Individual Atomization; Public Sphere; Samizdat

目录

引言 个体原子化与公共领域的解体	1
第一章 汉娜·阿伦特关于斯大林时代个体原子化的论述	10
第一节 20 世纪以来的极权主义学说	10
第二节 阿伦特对斯大林苏联的批判：个体的衰败和公共领域解体	13
第三节 阿伦特的回应：复数的人与重建公共领域	18
第二章 痛苦的自我锻造：日记中的个人生活	26
第一节 修正主义研究新路径	26
第二节 日记：自我改造的私人记录	28
第三章 公共领域的重建与萨米兹达特现象	43
第一节 阿伦特、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定义	43
第二节 萨米兹达特现象简介	45
第三节 个体的自我彰显：萨米兹达特重建公共领域	47
小结	55
结语	62
参考文献	64

Contents

Introduction Individual Atomiza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Public Sphere.....	1
Chapter 1 Hannah Arendt's Discussion of Individual Atomization in Totalitarian Society.....	10
Section 1 Totalitarian Theories Since the 20th Century.....	10
Section 2 Arendt's Critique of Totalitarianism: the Degeneration of Individual and the Collapse of Public Sphere.....	13
Section 3 Arendt's Response: Plurality and Reconstruction of Public Sphere	18
Chapter 2 The Agonizing Self-Remoulding: Private Experience in Diary.....	26
Section 1 New Theoretical Path of Historical Revisionism.....	26
Section 2 Diary: Private Record of Self-Remoulding	28
Chapter 3 Reconstruction of Public Sphere and Samizdat	43
Section 1 Arendt, Habermas' Defini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43
Section 2 The History of Soviet Union Samizdat.....	45
Section 3 The Disclosure of Individual: the Influence of Samizdat.....	47
Chapter Conclusion	55
Conclusion	62
References.....	64

引言 个体原子化与公共领域的解体

苏联诗人布罗茨基曾这样描述过自己的日常生活：

我在工厂打交道的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那时我十五岁，开始当一个铣床操作员。马克思会一眼就认出他们。他们——或者应该说“我们”——全都住在集体公寓里，四个或不止四个人一个房间，常常是三代同堂，轮流睡觉，像鲨鱼那样喝酒，互相争吵或在公共厨房内或早上在公共厕所前排队时与邻居争吵，以垂死的决心打他们的女人，在斯大林暴死时或在看电影时当众痛哭流涕——而在代表埃及或别的什么国家而举行的公开集会上，则会变成灰色而冷漠的人头之海，或举手的森林。^①

布罗茨基的侧写展示了两个层面的“苏维埃日常性”：狭窄逼仄的居住条件、物质的匮乏带来的无休止排队导致了私人空间的消失；而在公共领域，苏维埃时代的泛政治化塑造了一种虚伪的狂热——公民可以为领袖的死亡痛哭流涕、无条件支持国家意志，但这种政治性表达只是自我保护的面具，“举手的森林”们实际上对公共政治议题并不关心。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②的回忆录中记录苏联“日常性”的另一个特点，即无法摆脱的恐惧感和人际关系的解体：

可是生活环境却让我们成了准地下工作者。见面的时候我们会小声说话，警惕地盯着四壁，看有无邻居窃听……当我在战后来到了莫斯科时，我发现每一家的电话都用一个大枕套蒙着，因为有一种传闻说电话上装有窃听装置，在这个能够窃听到人们隐秘思想的黑色金属侦查员面前，所有居民都会

^① 布罗茨基：《小于一》，黄灿然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9月，第10页。

^② 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曼德尔施塔姆（1891—1980）：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妻子。曼德尔施塔姆于1938年第二次被捕，同年年底死于海参崴附近的劳改营。娜·曼德尔施塔姆将丈夫与自己在斯大林时代的经历记录下来，一部分文字1961年以雅科夫列夫的笔名在帕乌斯托夫斯基和潘琴科创办的地下杂志《塔鲁萨之页》发表；1970年与1974年，两部回忆录《希望对抗希望》、《被遗弃的希望》正式在西方出版。这两部回忆录在后斯大林时代均通过萨米兹达特（自制出版物）和塔米兹达特（境外出版物）的形式在苏联地下传播。

恐惧地发抖。所有人彼此均不信任，我们怀疑每一位朋友都可能是告密者。有时会让人觉得，整个国家都患上了侦查狂躁症。直到如今，我们这一病症仍然没有痊愈……1937年后，人们已经停止互相见面……他们（秘密机关）成功削弱了人们之间的联系，使整个社会分裂。^①

对斯大林时代的苏维埃公民来说，娜·曼德尔施塔姆提及的被窥视的恐惧以及人际之间信任的丧失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不单是富农、神职人员、前沙皇军官这些“阶级敌人”，也包括36年大清洗开始以后被更宽泛的“人民公敌”概念（the enemy of people）容纳的知识分子、党内异见分子乃至最普通的苏联公民，都无法避免这种被监视的恐惧。恐惧破坏了日常生活的私密性，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其结果是苏联社会形成了特殊的“耳语”^②现象——一方面，每个公民都是权力的毛细管，他们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者和OGPU的^③神经末梢，有义务探听他人的隐私；另一方面，个体将这种恐惧内化成无法磨灭的本能：习惯缄默，习惯隐瞒自己的真实感受。

如果偷听到大人的耳语，或是背着我们的悄悄话，我们都很清楚，绝对不能转述给任何外人……有时候，大人脱口说了什么，然后告诉我们“隔墙有耳”，或“小心你的舌头”，或其他表述，我们马上就懂，他们刚刚说的，本是我们不应听到的。（一位布尔什维克中层官员女儿的回忆）

我们从小就学会了如何闭嘴。“舌头会给你带来麻烦”——这是大人一直叮嘱我们孩子的。我们在生活中也一直害怕发表意见。妈妈常说，两人之中必有一名举报人。我们害怕邻居，特别是警察……即使在今天，我看到警

^① 娜·曼德尔施塔姆：《曼德尔施塔姆夫人回忆录》，刘文飞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第35页。

^② “耳语”这个概念引自奥兰多·费吉斯的观点。“俄罗斯语言中有两个词代表耳语者，第一是指怕人偷听而窃窃私语的人（shepehushcii），第二指暗地里向当局汇报的举报人（sheptun）。个中的区别起源于斯大林年代，其时，整个苏维埃社会全由耳语者组成，或是第一种，或是第二种。”奥兰多·费吉斯：《耳语者：斯大林时代的私人生活》，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第6页。

^③ OGPU：格别乌(ОГПУ)，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前身为1917年成立的“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分子特别委员会”（契卡）。

察仍然会害怕得发抖。（一名女子的回忆，其父于 1936 年被捕）^①

恐惧的产生当然也离不开国家强力机关的介入。在大清洗达到高潮的 1937-38 年，传讯、逮捕成为普遍的社会景观。一则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广为流传的政治笑话很好地说明了逮捕带来的心理变化：

苏联公民在讨论什么是幸福。

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半夜有秘密警察敲门，开门后：

“伊万，你被捕了！”

“对不起，你弄错了，伊万在隔壁。”

忠诚的共产党员叶夫根尼娅·谢苗诺芙娜·金兹堡回忆了普通人对“黑湖地下室”^②的恐惧：

但是自从 NKVD^③搬进黑湖街之后，这个名字就失去了它的原意，它获得了“卢比扬卡”^④在莫斯科的含义。人们常说，“小心你的舌头，不然你会被抓进黑湖”或者“你听说了吗？昨天晚上他们把他抓到黑湖里去了！”^⑤

在阿巴库莫夫^⑥1947 年 7 月 17 日写给斯大林的备忘录中，强调为了防止逃跑反抗以及阻止疑犯向其他反革命同伙发出警告，警察有必要让犯人“措手不及”。逮捕往往发生在半夜，60 年代格拉西莫夫的小说《夜半敲门声》与扬波尔斯基的《莫斯科一条街》三部曲（《阿尔巴特街》、《漫长的一天》、《夜间灯火》）描

^① 奥兰多·费吉斯：《耳语者：斯大林时代的私人生活》，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 9 月，第 4 页。

^② 黑湖原来是卡赞的市政公园，而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办公地点正好位于黑湖街，人们便以“黑湖”代指当地的内务机关。

^③ NKVD：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斯大林时代最重要的内务机关，也是三十年代大清洗主要负责机构。

^④ 从“契卡”（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开始一直到“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苏共历代内务机构的总部都位于莫斯科的卢比扬卡广场，莫斯科居民常以地名“卢比扬卡”代指苏联的内务机构。

^⑤ Ginzburg, Eugenia. *Journey into the Whirlwind*. San Diego: Harcourt, 1967: p.52.

^⑥ 阿巴库莫夫：苏联内务部领导人，贝利亚的副手，1954 年被枪决。

述了斯大林时期弥漫的对午夜敲门声的恐惧以及人们情感的异化。1970年，哈佛大学开展了针对苏联移民的采访调查项目，有相当多受访者强调大恐怖年代个人命运的不可预测性：你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因何种原因而被捕，但是大难临头的预感时刻都存在。人们在等待自己的厄运，很多人收拾好包袱，一旦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人敲门，随时都可以上路。柳博芙·沙波利娜在日记中写到：

日常生活的快乐。我早晨醒来时情不自禁地想到，感谢上帝，昨晚没事。他们不会在白天抓人，但今夜如何，却没人知晓……我很幸运，心里一片平静，根本不在乎。但大多数人却生活在彻头彻尾的恐惧之中……^①

科洛布科夫回忆了父亲对深夜汽车的恐惧：

每天晚上，他都很警觉——等候汽车发动机的声响。如果有，他就会在床上坐起不动，一副吓坏的模样……他听到车声，总是说“他们来找我了”。他确信，自己将因出言不慎而被捕——他曾在家里咒骂布尔什维克。他听到发动机熄火和车门关闭声，就会从床上爬起来，在恐慌中摸索自以为最重要的东西。这些物件始终放在床边，以备“他们”的到来……很多夜晚，父亲几乎彻夜不眠——等候一辆始终没有出现的汽车。^②

有些时候，等待的焦虑产生了微妙的结果：被捕被一部分人看作解脱。苏联足球明星尼古拉·斯塔罗斯京被特工跟踪了几个星期，由于无法忍受这种压力，他甚至走到跟踪他的特工面前要求给他一个解释：“如果你们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那就把我叫到你们的办公室去。”斯塔罗斯京在被捕的那一刻，他感到的是“好奇”而不是“震惊和恐惧”。^③对于富农之子斯捷潘·波德鲁尼来说情况也是如此，长期的双面生活令他不堪重负，他甚至幻想，如果出身被 OGPU 识破，随

^① 奥兰多·费吉斯：《耳语者：斯大林时代的私人生活》，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第254页。

^② 奥兰多·费吉斯：《耳语者：斯大林时代的私人生活》，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第254页。

^③ 安妮·阿普尔鲍姆：《古拉格：一部历史》，戴大洪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4月，第136页。

之而来的惩罚将是罪行的涤清——这意味着斯捷潘再也不用因为自己的出身担惊受怕。在日记中他用一个高度苏维埃化的词语来形容这场解放性的最终审判——这是“伟大的历史时刻”。^①

斯大林时代有多少人卷入了这场悲剧？我们可能永远都不能得到一个没有争议的统计数字。但可以肯定的是，几乎每个苏联公民都直接或间接受其影响。1988年12月25日苏共政治镇压受害者平反委员会提交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简要报告》。作为苏联承认的官方文件，《报告》指出斯大林时代约有370万苏联公民被镇压。从1930年到斯大林逝世，苏联国家机关先后制造了2578575起案件，涉及3778234人，其中有70多万人处决，另外尚有一百多万起案件没有来得及重新审理，涉及近220万人。^②2013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前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平反委员会领导人雅科夫列夫的著作《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书中认为官方的数字过于保守，据他估计，苏联年代因政治原因“被杀害、死于监狱和劳改营”的人数达2000万。^③奥兰多·费吉斯认为，约有2500万人——遭行刑队处决的犯人、古拉格政治犯、流放至特殊定居地的“富农”、遭到强制奴役和驱逐的少数民族——受到斯大林政权的镇压，“1941年，苏维埃总人口估计是2亿，换言之，平均1.5户家庭即有1人”。^④阿普尔鲍姆估计，1929年到1953年间，大约有1800万苏联公民被拘禁在劳改营和移民定居点，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高达几百万的特殊移民（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富农以及其他少数族裔群体），苏联被强制劳动者的总数可能达到2870万人，死亡人数达270万。^⑤2004年3月24日在莫斯科出版了《苏联政治恐怖的牺牲者》一书，其中收录了134万人的名字（2014年已达300万）。即使我们采信以上说法中最小的数字，也意味着有名有姓的134万个体，以及他们受到牵连的家庭被迫卷入了一场苦涩的悲剧。

大规模的逮捕和流放制造了独特的社会景观。苏联人民曾长期因为物资短缺而排队，但在三十年代，不是为了国营商店里的面包，而是为了获得一点亲人的

^① Fitzpatrick, Sheila. ed. *Stalinism: New Direc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00: p.98.

^② 《炎黄春秋》2014年第3期，《苏共中央政治局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的简要报告》

^③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述弢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91页。

^④ 奥兰多·费吉斯：《耳语者：斯大林时代的私人生活》，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引言部分。

^⑤ 安妮·阿普尔鲍姆：《古拉格：一部历史》，戴大洪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4月，第635-639页。

信息，被捕者可怜的妻子和母亲需要在涅瓦河畔排队。作家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在1939年创作了小说《索菲娅·彼得罗芙娜》。这部小说是作者1937年“在监狱门前排了两年队随后写成的”。^①主人公彼得罗芙娜在打探儿子消息的时候，经历了一次典型的苏维埃式排队：

街上聚集的一大群女人引起了她的注意。有的人靠着岸墙站着，有的人在人行道和马路上慢慢踱着。索菲娅·彼得罗芙娜感到惊讶的是所有人都穿得很多：大衣外面围着围巾，几乎都穿着毡鞋和套鞋。她们跺着脚，往手上哈气。所有女人的样子都像在小车站上等了几个小时火车似的……

人越聚越多。“您是几号？”不时有人问索菲娅。“今天轮不到您了，”一位用头巾像农妇那样裹得严严的女人对她说，“我们昨天就登记了。”

人群突然向前冲去，索菲娅·彼得罗芙娜也跟大家一起跑……人群转到什帕列尔纳亚大街。她老远看到大铁门上的小门打开了，女人们像挤电车似的挤进去。索菲娅·彼得罗芙娜也挤进去了，但是马上停住，再不能向前一步，再不能向前一步了。女人们挤在昏暗的走廊里和狭窄的木楼梯上。人群蠕动。所有人都解下头巾，打开领口挤向什么地方，寻找上次去过的和随后要去的房间。后面的人拼命向前挤。索菲娅·彼得罗芙娜被挤得像木片那样到处转……^②

排队作为苏联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构成了苏联人的文化背景。后斯大林时代，排队制造的公共空间为街头巷议、政治逸闻的传播创造了可能，一个脱离国家管控的空间得以形成。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公民创作了大量与排队有关的政治笑话。^③而在30年代，监狱外的长队还有另一重意义。在这个时空之中，个体原子化的状态暂时被打破了。个体之间的有机联系得以恢复，因恐惧带来的冷漠逐步消解。作为单独的个体，她们可能是莫斯科的中学老师，也可能是敖德萨的农妇，

^① 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捍卫记忆：利季娅作品选》，蓝英年、徐振亚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11年9月，第2页。

^② 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捍卫记忆：利季娅作品选》，蓝英年、徐振亚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11年9月，第29页。

^③ 关于苏联政治笑话的研究，可参见 Adams, Bruce. *Tiny Revolutions in Russia: Twentieth-century Soviet and Russian History in Anecdotes*, Lewis, Ben. *Hammer and Tickle: The Story of Communism*.

但是当身处队伍之中，她们只有一个身份：她们是被捕者的母亲和妻子。女人们分享同样的政治境遇，为了相同的目标在特定的时空中结成暂时的命运共同体，互通信息，彼此抚慰。在国家镇压机器以及冷漠官僚面前，个体无疑是脆弱的，但是人群用无言的默契来传递不屈和反抗。在苏联严酷的政治环境下，这种不屈显得极其珍贵。

公开的自我批判也是苏维埃公民需要经历的考验。当事人在公共场合痛陈自己过往的罪行，将隐藏的自我当众坦白。人们陷入忏悔的狂欢，力求在批判的态度上压倒他人：

宽敞拥挤的演讲大厅变成了公开认罪的场所。尽管脱罪过关非常困难——那些悔悟的表达多半会认定为不充分而被拒绝——认罪的激流一天一天壮大……

“有罪的人”捶胸顿足，悔恨哀叹自己“政治觉悟低”，“缺乏警觉性”，“与怀疑主义没有斗争到底”，以及“被腐朽的自由主义污染”。

许多类似的声音在公共建筑的拱顶下回荡。报纸也是这样，充斥着党内理论家的忏悔文章……NKVD的力量和重要性在一天天增强。^①

今天我们在讨论苏维埃生活的时候往往会陷入一个误区，即把苏联时代的NKVD、OGPU与纳粹的盖世太保以及日后大名鼎鼎的克格勃等同起来，认为它们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秘密警察，与日常生活相距甚远。但是与通常想象不同，斯大林时代的秘密警察其实并不“秘密”，NKVD对隐藏自己毫无兴趣，文学、电影都能看到它们的存在，可以说它们甚至是苏维埃日常生活不可分离的一部分。1939年上映的电影《列宁在1918》，就有非常多对NKVD前身“契卡”的正面描写。1937年大清洗达到高潮，苏联的报纸上充斥着对NKVD及其领导人叶若夫的吹捧，并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了庆祝内务部成立20周年的盛大庆典。^②除了监视与逮捕，内务部与苏联文学界的合作也十分紧密。俄国文学大师如巴别尔、布尔加科夫都曾为内务部的官员写过传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的典型代表——

^① Ginzburg, Eugenia. *Journey into the Whirlwind*. San Diego: Harcourt. 1967: p.11.

^② Vatulescu, Cristina. *Police Aesthetics: Literature, Film, and the Secret Police in Soviet Times*.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2.

《以斯大林名字命名的运河》，这部罔顾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工程导致 25000 名劳改犯死亡的事实、讴歌古拉格劳改制度的文集，就是由高尔基与阿韦尔巴赫带领的 120 名作家与 OGPU 官方合作共同编写的。内务部作为苏联国家意识形态的监督者，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应该低估的。

本文已列举了苏维埃生活有代表性的几个横截面。斯大林时代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私人生活的政治化。通过乌托邦理想的感召、意识形态再阐释、公共生活仪式的规范作用、经济生产与分配的国家管控、文学作品的诱导以及强力机关介入，私人领域被入侵和重塑，个体与集体、私人与公共的界限变得模糊以致消失，其结果是苏联成为了前所未有的“总体国家”（Total State）。如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克拉科夫斯基所言：“根除所有不受国家强制与管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是苏联历史的基本原则。”^①苏维埃意识形态不仅寻求在社会经济层面上消灭私人结构，同时还要在意识领域完成排除个体的纯化。将私人生活纳入国家的管控并以集体主义加以改造，是苏联布尔什维克一直追求的目标。对于苏联公民来说，不存在完全私人和非政治的生活。共青团真理报明确地指出：“日常生活不是私人的事务，它是阶级斗争最关键的领域。日常生活与政治不可分离。那些在日常生活中不诚实、道德堕落的人，在政治上也是堕落的。”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警告：“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划出界限迟早会导致对共产主义的背叛。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将我们的私人生活与建设共产主义的奋斗结合起来。”^②这种观念的改造影响非常深远，有些情况下会以无意识的方式被个体接受。90 年代美国学者采访了一部分经历了 30 年代苏联生活的俄国女性农民。研究者起初设想，生育和抚养孩子对女性来说是标志性事件，但是在采访过程中研究者发现，支配这些女性记忆并不是她们的孩子，而是 30 年代的政治事件。这些政治性事件不仅主宰着她们的生活，而且主宰着她们的记忆的方式，她们会把这些事件发生的时间当做记忆的标示。^③

本文将利用日记、回忆录、档案以及文学作品作为材料对私人生活和苏维埃

^① Priestlan, David. *Politics of Mobilization: Ideas, Power, and Terror in Inter-war Russ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5.

^② Hellbeck, Jochen. *Revolution on my mind: writing a diary under Stalin*.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87.

^③ Fitzpatrick, Sheila. *Everyday Stalinism: Ordinary Life in Extraordinary Times: Soviet Russia in the 1930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21.

Degree papers are in the “[Xiamen University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Database](#)”.

Fulltext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If your library is a 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log on <http://etd.calis.edu.cn/> and submit requests online, or consult the interlibrary loan department in your library.
2. For users of non-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mail to etd@xmu.edu.cn for delivery details.